
亲社会行为

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冯琳琳 / 著

The Influence of Prosocial Behavior on Happiness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亲社会行为

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冯琳琳 / 著

The Influence of Prosocial Behavior on Happiness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 冯琳琳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 - 7 - 5203 - 3482 - 2

I. ①亲… II. ①冯… III. ①幸福—社会心理学—研究
IV. ①B82 ②C91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150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丽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项目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18YJC190003)

山东理工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4033/718003)

山东理工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预研专项资助(4032/718010)

山东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经费资助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4)
第一节 研究背景	(4)
第二节 以往研究不足及问题提出	(40)
第三节 本书拟研究的问题	(44)
第二章 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 中介作用	(48)
第一节 利他行为影响幸福感的横断研究：基本心理需要 满足的中介作用	(49)
第二节 助人行为影响幸福感的日记研究：基本心理需要 满足的中介作用	(59)
第三节 志愿行动影响幸福感的追踪研究：基本心理需要 满足的中介作用	(73)
第三章 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 中介作用及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	(82)
第一节 事件回忆启动范式下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83)

第二节 事件回忆启动范式下自主—受控动机的亲社会行为 对幸福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91)
第三节 假设情境启动范式下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及亲社会动机的 调节作用	(101)
第四章 亲社会行为对实施者、接受者和旁观者幸福感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及亲社会动机的 调节作用	(111)
第五章 亲社会行为干预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	(127)
第六章 综合讨论	(140)
附录	(164)
参考文献	(176)

绪 论

当前国内外研究者针对亲社会行为和幸福感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首先，已有研究大多关注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相对忽视了亲社会行为的结果变量，尤其是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其次，已有关于亲社会行为影响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对两者间具体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的考察较为缺乏。再次，尚未有研究统合探讨亲社会行为对行为实施者、接受者和旁观者三者幸福感的影响，有待研究从整体上理解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后，已有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尚不能深入、细致地揭示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中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有待研究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系列论证。

鉴于上述原因，本书拟综合采用横断研究、日记研究、追踪研究、实验研究以及干预研究考察不同形式的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具体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探讨亲社会行为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第二，探讨亲社会行为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及幸福感的调节机制——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第三，通过对行为实施者、接受者和旁观者三者的幸福感体验进行统合考察，探讨亲社会行为对三者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第四，通过干预研究，探讨亲社会行为干预能否促进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本书共包括四个研究：

研究一包括3个子研究（均采用问卷研究，其中研究1为横断研究，研究2为日记研究，研究3为追踪研究），试图考察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其中，研究1以681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横断研究，考察利他行为（包括亲缘利他、互惠利他和纯粹利他）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研究2以96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连续2个周的日记研究，考察自发的、非正式的亲社会行为——日常生活中的助人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研究3以83名从事志愿行动的社团成员和94名未参加该类社团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间隔4个月的追踪研究，考察有组织的、正式的亲社会行为——志愿行动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研究二包括3个子研究（均采用准实验研究），试图考察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及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其中，研究1以118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回忆启动范式考察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研究2以177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研究1的基础上纳入亲社会行为的动机，采用事件回忆启动范式考察自主—受控动机的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研究3以17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一步采用假设情境启动范式考察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

研究三（采用实验研究）试图统合考察亲社会行为对亲社会行为实施者、接受者和旁观者三者幸福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及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研究三以18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室情境模拟，分别考察亲社会行为对行为实施者、接受者和旁观者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

研究四（采用干预研究）试图考察亲社会行为干预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以期基于前述研究探索提升大学生幸福感的新途径。研究四以78名大学生为实验组被试，另外95名大学生为控制组被试，对实验组被试

的亲社会行为进行为期 2 个月的干预，考察亲社会行为干预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

本书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 中国文化背景下亲社会行为能够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2)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亲社会行为有利于自主性需要、能力感需要和关系性需要的满足，进而有利于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3) 亲社会动机在亲社会行为对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及幸福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主动动机的亲社会行为有利于自主性需要和关系性需要的满足，进而有利于幸福感水平的提升；而受控动机的亲社会行为则不利于自主性需要的满足，进而不利于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4) 亲社会行为不仅有利于实施者幸福感水平的提升，还有利于接受者和旁观者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实施者而言，相比低主动动机的亲社会行为，高主动动机的亲社会行为更有利于自主性需要和关系性需要的满足，进而有利于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接受者和旁观者而言，相比低主动动机的亲社会行为，高主动动机的亲社会行为更有利于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5) 亲社会行为干预对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说明鼓励人们做出亲社会行为能够起到提升幸福感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书基于西方已有研究成果，首次采取多种方法对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即时性和延时性影响进行系列论证。在此基础上，本书以自我决定理论中的基本心理需要理论和有机整合理论为理论指导，考察了亲社会行为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包括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以及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本书通过一系列研究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对于丰富亲社会行为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提升亲社会行为和幸福感水平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亲社会行为

(一) 亲社会行为的界定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s）泛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而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①，主要包括助人、分享、谦让、志愿行动、安慰、合作以及慈善捐助等^②。

从个体视角而言，亲社会行为具有提升个体自尊，实现个体自我满足的功能^③；从人际关系角度而言，亲社会行为有助于增进人际交往，促进人际适应和人际和谐^④；从社会层面而言，亲社会行为是社会公益和社

① 参见金盛华《社会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② Bekkers, R. , & Wiepking, P. , “Testing mechanisms for philanthropic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6 (4), 2011; Brief, A. P. , & Motowidlo, S. J. , “Prosoci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1 (4), 1986; Feng, L. , & Guo, Q. , “Beneficial effect of altruism on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self-esteem and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43 (3), 2016; Wilson, A. , “Improving life satisfaction for the elderly living independently in the community: Care recipients’ perspective of volunteers,” *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51 (2), 2012.

③ Laible, D. J. , Carlo, G. , & Roesch, S. C. , “Pathways to self-esteem in late adolescence: The role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empathy, and social behaviour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7 (6), 2004; Yates, M. , & Youniss, J. ,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community service in adolescence,” *Social Development*, 5 (1), 1996.

④ Campbell, L. , Gulas, C. S. , & Gruca, T. S. , “Corporate giving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er social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 (4), 1999.

会责任的象征，更是社会和谐发展与建构的基础^①。因此，亲社会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

对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初的研究重点在于对一般助人行为的情境因素及背后的动力机制的探讨。助人行为指的是一种以特定的个人或群体为对象的比较宽泛的亲社会行为，既包括帮助陌生人，也包括帮助自己认识的人^②。近些年，关于助人行为的群体间与跨群体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③。随着志愿者这一社会角色以及社会公益组织的大量出现，对于志愿行为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亲社会行为研究的热点话题。与传统的亲社会行为研究领域关注临时的、自发的助人行为不同，志愿行为属于一种有计划地、长期地无偿帮助他人、集体或社会的亲社会行为^④。作为公众参与到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志愿行为已经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形式。捐赠行为区别于助人行为和志愿行为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接受者通常并不处在捐助情境中^⑤。对助人行为、志愿行为、捐赠行为进行统一探讨，有助于对亲社会行为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当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不期望任何回报时，称之为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s）。在概念上，利他行为从属于亲社会行为的范畴，但利他行为的概念更为严苛，属于最高形式的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不仅具有利他的特性，还具有社交的特性，是个体重要的社会适应行为^⑥。利他性通常指亲社会行为的发出者会为他人的福祉考虑；社交性通常指亲社会行

^① Penner, L. A., Dovidio, J. F., Piliavin, J. A., & Schroeder, D. A., "Prosocial behavior: Multileve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6 (1), 2005.

^② Bekkers, R., & Wiepking, P., "Testing mechanisms for philanthropic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6 (4), 2011; 金盛华：《社会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曾盼盼、俞国良、林崇德：《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教育科学》2011 年第 1 期。

^④ Snyder, M., & Omoto, A. M., "Volunteerism: Social issues perspectives and social policy implications,"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2 (1), 2008.

^⑤ Bekkers, R., & Wiepking, P., "Testing mechanisms for philanthropic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6 (4), 2011.

^⑥ 寇彧、付艳、马艳：《初中生认同的亲社会行为的初步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004 年第 4 期。

为主要发生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可以使互动中的个体间关系变得更加和谐^①。利他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指降低自身生存适合度以帮助其他个体的行为，以助人为主要目的^②。

自 2010 年起，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CAF）委托 Gallup 调查机构对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有关亲社会行为的全球性调研，调研对象可代表全世界 95% 的 15 岁及以上人口，并每年发布世界捐赠指数（World Giving Index, WGI）报告。该报告以“助人行为”“志愿行为”“捐赠行为”三种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指标对各国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进行排名，中国连续三年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这一结果与中国乐善好施的传统礼仪之邦形象大相径庭，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亲社会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分析。

（二）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理论

1. 亲缘选择理论

研究发现，相对于无关的人，个体更倾向于帮助自己的亲属，这符合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 theory）^③。该理论的前提是所有来源的基因能够成功地传递给下一代^④。亲缘选择理论认为，个体为了能更好地使自己的基因得以繁衍，首先会选择帮助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亲缘关系越近，亲社会行为倾向越强^⑤。个体的这种选择会使其整体利益最大化，因而长期帮助亲属的个体将从进化层面上获益。

亲缘选择理论也被称为内含适应性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内含适应性指个体的行为或影响的属性，是个体自身繁殖成功与个体对其

^① 寇彧、付艳、马艳：《初中生认同的亲社会行为的初步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004年第4期。

^② Schwartz, C. E., Quaranto, B. R., & Gray, K., “Altruism and health: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Efklides, A., & Moraitou, D. (Eds.), *A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 on quality of life*, Amsterdam: Springer, 2013.

^③ Barrett, L., Dunbar, R., & Lycett, D., *Huma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Hamilton, W. D.,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 1964.

^⑤ Hamilton, W. D.,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 1964.



亲属繁殖成功的影响程度之和^①。内含适应性理论假设，自然选择通常会偏爱在亲缘关系中做出更多亲社会行为的个体。个体间血缘关系越近，亲社会行为的收益就会越大，代价或成本则会相对较小^②。Hamilton 认为，如果亲社会行为的接受者获得的收益乘以接受者携带实施者基因的概率值，大于实施者所付出的代价，这样亲社会行为有关的基因就能够得以进化。Hamilton 还指出，个体在能够激发不同行为的不同情境中根据适合于该情境的关系系数去评估周围的个体以及自己的适应性是物种社会行为的进化方式。Hamilton 限定了帮助亲属的基因得以进化的条件，阐明了亲社会行为有关的基因在进化过程中所受到的选择压力。内含适应性理论认为，个体所有的亲属都是他们适应性的载体，但是这些亲属的价值会有所不同^③。但亲缘选择理论无法解释发生在彼此无关联的个体之间的亲社会行为。

2. 群体选择理论

与亲缘选择理论从个体的角度对亲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有所不同，群体选择理论（group selection theory）是从群体的层面对亲社会行为进行解释。如果两个群体存在直接的竞争，拥有较多亲社会行为个体的群体会比拥有较多自私行为个体的群体更有生存优势^④。从进化的角度看，群体选择理论与亲缘选择理论一样强调亲社会行为的整体适应性。

基于群体选择理论，个体对群体内成员和群体外成员的亲社会行为会存在差异。有研究发现，当资源被群体内成员共享，而非群体外成员共享时，个体更愿意合作；当处于相同的需求情境中时，个体更愿意帮助群体内成员^⑤。通常相对于群体外成员，群体内成员更容易被看作是与

① Dawkins, R., *The extended phenotype*, Oxford: W. H. Freeman & Co, 1982.

② Hamilton, W. D.,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 1964.

③ 参见巴斯《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④ 肖凤秋、郑志伟、陈英和：《亲社会行为产生机制的理论演进》，《心理科学》2014 年第 5 期。

⑤ De Dreu, C. K., Greer, L. L., Handgraaf, M. J., Shalvi, S., Van Kleef, G. A., Baas, M., et al., "The neuropeptide oxytocin regulates parochial altruism in intergroup conflict among humans," *Science*, 328 (5984), 2010.

自己相似的，这种相似性会促进亲社会行为^①。

3. 互惠利他理论

上述亲缘选择理论和群体选择理论能够解释亲属间和群体内的亲社会行为，互惠利他理论（reciprocal altruism theory）则能够解释陌生人之间的亲社会行为。互惠利他理论认为虽然亲社会行为会给个体带来损失，但是也会给个体带来收益，收益有时是即时的，有时是延时的^②。Trivers 提出互惠利他是指利他行为带来的好处远大于成本，并在一段时间内互动双方都能够获益。Cosmides 和 Tooby 将互惠利他行为定义为两个或多个个体为了相互的利益而发生的合作行为，并且他们提出“双赢”以指互动双方在交换中所获得的回报会比利他行为实施者付出的代价要高^③。从进化的角度看，这种“双赢”为互惠利他行为的进化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如已有研究发现，个体曾经帮助的人会在个体需要帮助时帮助自己，或者个体在提供帮助的同时能够提高自己所在群体的地位和声望^④。

基于互惠利他理论，只要利他行为实施者能够在将来某个时刻从互惠者那里获得回馈式的收益，促使人类在非亲属之间产生利他行为的心理价值就能够得以进化。互惠利他行为的特点在于互惠的双方都能从利他行为中获益^⑤。做出互惠利他行为的个体往往比自私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繁殖成功率，促使互惠利他行为的心理机制会在其后代中慢慢传播。因此，如果利他行为的接受者给予利他行为的实施者报答，那么利他行为和利他特质就会被保留下来。如果利他行为的实施者从利他行为的接受者那里得到的收益多于之前的付出，利他行为实施者的繁殖机会就会多

^① 肖凤秋、郑志伟、陈英和：《亲社会行为产生机制的理论演进》，《心理科学》2014 年第 5 期。

^② Trivers, R. L.,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1971.

^③ Cosmides, L., & Tooby, J., "Cognitive adaptations for social exchange," In Barkow, J., Cosmides, L., & Tooby, J. (Eds.), *The adapted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④ Wedekind, C., & Braithwaite, V. A.,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human generosity in indirect reciprocity," *Current Biology*, 12 (12), 2002.

^⑤ 参见巴斯《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于未做出利他行为的个体。

4. 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Crick 和 Dodge 提出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亲社会行为^①。在该模型中，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包括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线索编码，在这一阶段，个体注意到他人求助的社会线索。第二阶段是线索解释和表征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对前一阶段注意到的线索加以解释，对所处的情境进行判断。第三阶段是反应生成，在这一阶段，个体基于当前的情境生成各种可能的行为反应倾向，但是这些行为反应倾向会因为个体自身能力以及所拥有资源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第四阶段是反应决定，在这一阶段，不同的行为反应倾向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同的结果，个体对这些行为反应倾向和相应的可能结果进行评估，选出最佳的行为。第五阶段是反应执行，即亲社会行为的实施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真正地表现出亲社会行为^②。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考虑了行为将会给对方带来的帮助，较为完善地描述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过程。

(三) 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方法

在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方面，研究者们通常采用调查问卷进行测量或者通过官方数据库获取亲社会行为的客观数据，也会通过实验法有针对性地操控条件并观测亲社会行为。关于亲社会行为的问卷测量，Rushton 等编制的自我报告利他量表 (self-reported altruism scale) 得到广泛应用，该量表包括 20 个题目，但该量表并未对亲社会行为的类型进行任何区分^③。另外 Nickell 编制的助人态度量表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该量表同样包括 20 个题目，测量与助人有关的观念、感受和行为^④。寇彧等对

^① Crick, N. R., & Dodge, K. A.,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 (1), 1994.

^② 肖凤秋、郑志伟、陈英和：《亲社会行为产生机制的理论演进》，《心理科学》2014 年第 5 期。

^③ Rushton, J. P., Chrisjohn, R. D., & Fekken, G. C., "The altruistic personality and the self-report altruism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 1981.

^④ Nickell, G. S., *The helping attitude sca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San Francisco, 1998.

Carlo 编制的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PTM）进行修订，并将亲社会行为倾向区分为六种：公开的、匿名的、利他的、依从的、情绪性的和紧急性的亲社会行为^①。近年来，Oda 等编制的区分对象的自我报告利他量表（self-reported altruism scale distinguished by the recipient）对亲社会行为的类型进行了区分，根据受助对象的不同，测查了三种形式的亲社会行为，包括亲缘利他（对家人）、互惠利他（对朋友）和纯粹利他（对陌生人）^②。

亲社会行为常使用的实验范式包括：独裁者游戏^③、最后通牒游戏^④、公共物品游戏^⑤和囚徒困境实验^⑥等，另外还有真实情景中的捐赠行为、互助行为等^⑦，以及观察法，即在某些特定情景中观察特定的亲社会行为，并对其发生过程进行量化记录。

尽管问卷调查能够高效率地收集到大量标准化的数据，但其缺点在于会受到社会赞许性和参与者主观性的影响，降低亲社会行为数据的客观准确性。官方数据分析的方法尽管具有获取便捷、数据可观、可比性强、取样范围广等优点，却只能得到一般的行为数据，难以对复杂繁多的变量进行操控和分析，也不便于对机制进行探索。实验法一般能够排

^① 寇彧、洪慧芳、谭晨、李磊：《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的修订》，《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年第1期。

^② Oda, R., Shibata, A., Kiyonari, T., Takeda, M., & Matsumoto-Oda, A., “Sexually dimorphic preference for altruism in the opposite sex according to recipient,”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4 (4), 2013.

^③ Sheppard, B., & Cushman, F., “Evaluating norm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m-content, operator, and charitable behavior,” *Vanderbilt Law Review*, 63 (1), 2010.

^④ Haptontahl Jr., S. R., *But what's in it for me? Characterizing uncertainty in bargaining*, Saint Louis: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9.

^⑤ Rand, D. G., Greene, J. D., & Nowak, M. A., “Spontaneous giving and calculated greed,” *Nature*, 489, 2012.

^⑥ Twenge, J. M., Baumeister, R. F., DeWall, C. N., Ciarocco, N. J., & Bartels, J. M., “Social exclusion de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2007.

^⑦ Weinstein, N., & Ryan, R. M., “When helping helps: Autonomous motivation for prosocial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e on well-being for the helper and recipi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 (2), 2010.

除混淆变量，精确地控制所要研究的变量，得到的结论更为可靠，但其生态效度容易受到质疑，研究者需要论证实验范式中的行为对实际行为的代表性^①。上述三种测量方式各有优劣，因此有待研究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系列论证。

如前所述，慈善援助基金会委托 Gallup 调查机构对全球 140 多个国家进行有关亲社会行为的全球性调研并每年发布世界捐赠指数报告。该报告以“助人行为”“志愿行为”“捐赠行为”三种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指标对各国亲社会行为水平进行排名，并且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②。在本书中，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指标包括助人行为、志愿行为及捐赠行为，本书试图综合采用多种方法对不同形式的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系列探讨。

助人行为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形式，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杨丽珠和胡金生通过创建助人情景的方法来探讨儿童的情绪认知与助人意向以及助人行为的关系^③。采用类似的方法，岑国桢等以道德情景故事为实验材料，测查了在冲突背景下儿童的一般助人倾向^④。McClintock 和 Allison 采用邮件的形式，询问被试是否愿意做出助人行为并将助人的时间作为助人行为的测量指标^⑤。回顾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助人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助人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而且研究对象多以儿童为主，实验研究中对于助人行为的测量大多采用创设特殊助

^① 陆柯雯、任孝鹏：《慈善捐款行为：影响因素及机制》，《心理学进展》2014 年第 4 期。

^② Diener, E., Tay, L., & Myers, D. G., “The religion paradox: If religion makes people happy, why are so many dropping ou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 (6), 2011; Luria, G., Cnaan, R. A., & Boehm, A., “National culture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Results from 66 countrie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4 (5), 2014; Smith, P. B., “To lend helping hands: In-group favoritism,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d the national frequency of prosocial behavior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 (6), 2015.

^③ 杨丽珠、胡金生：《不同线索下 3—9 岁儿童的情绪认知、助人意向和助人行为》，《心理科学》2003 年第 6 期。

^④ 岑国桢、王丽、李胜男：《6—12 岁儿童道德移情、助人行为倾向及其关系的研究》，《心理科学》2004 年第 4 期。

^⑤ McClintock, C. G., & Allison, S. T.,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helping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 (4), 1989.